

先秦诸子

XIANQIN ZHUZI XUEPAI

学派

YUANLIUKAO

源流考

对先秦诸子学术活动的新认识

冯铁流 著

重庆出版社


先秦诸子

学派

源流考

对先秦诸子学术活动的新认识

冯铁流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对先秦诸子学术活动的新认识/
冯铁流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5
ISBN 7-5366-7143-1

I. 先... II. 冯... III. 哲学学派—研究—中国—
—先秦时代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724 号

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
——对先秦诸子学术活动的新认识
冯铁流 著

责任编辑 赖云琪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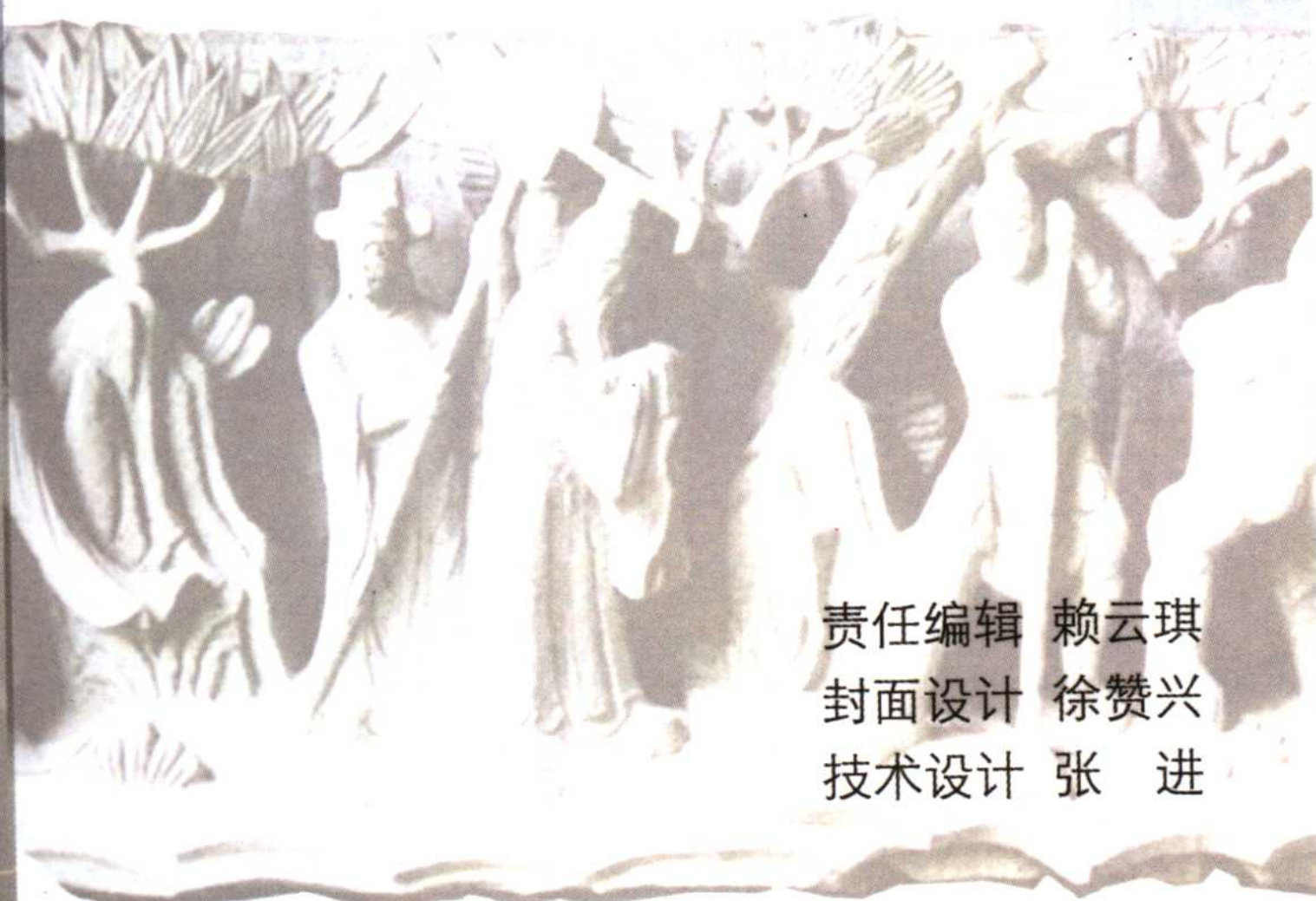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40 千 插页 2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7143-1/B·141
定价:18.00 元

书前提示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对先秦诸子各派学说进行了八十多年的探讨，迄今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世称为新诸子学。此书是作者继众多学人之后，以符合科学的全新认识方法，根据先秦史料为主的可靠资料，实证地描述先秦诸子各派的起源、发展，以及它们到秦汉以后，嬗变而为今日中华传统主流派学术文化的实际过程的专著。希望这部书，不仅只供研究古史的专家学者阅读，并且对于爱好传统文化的广大青年来说，也能给他们提供新的认识和治学方法，使其对我国文化流变的过程，能建立起更符合于客观历史事实的，正确的发展史观。

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



责任编辑 赖云琪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张 进



作者简介

冯铁流，本名冯金源，1927年7月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抗战时入川，1944年定居渝州，多年研读先秦诸子与经史至今。



以新方法研究先秦诸子 的《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代序)

这部书,是在21世纪来临之际,由研究先秦诸子已有半个世纪的冯铁流,采用全新的论点写成的。作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着重于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庄子、老子等各家各派学说,都在中国产生了,若我们今日能不依靠传统旧说,而仅根据先秦可靠史料,以实证的方法来认识他们,那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诸子,它的学说会是怎么一种样子?这些学派的起源与发展形成经过,又会怎样在我们面前显示出来?与今人所说相同吗?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这些学派的思想文化,已演变转化而汇入到现代人所见的所谓“中华传统文明”之中。但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演变转化过程?

作者把这些经过全新研究而作出的结论,全都写进了这部书里,想为诸子学研究另辟一新方向。

讲先秦诸子的书,两千年来不知凡几,早已是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能以科学的观点来考察先秦诸子真况并加以描述的,却还一部都难见。目前的中国哲学类著作讲述诸子,实际上,大都还只是按照东汉、魏晋以来近两千年中人们相沿成习的旧的研究路子,去对先秦诸子进行认识的。他们认为这才是惟一的正确方法。即使有修正,也只是细节上的。

但要知道,古书对诸子的记述,实际上,却只先秦人所作的可



靠记载以及西汉的部分可靠史料,才是真实的、可依据的。但这些为数过于稀少。所以,东汉、魏晋以来近两千年中的有关先秦诸子的论述,更多地数量上超过了那些真实可信的史料。近代人讲先秦诸子的著作,就不免对这些东西凭自己的观点,大量地择用,而视之为诸子学的开门钥匙。要知道,东汉以来近两千年中的著作,由于距先秦已远,对诸子的年代都往往已不明了,记诸子事往往出于揣测者多。有的只是传说,并且受当时已流行起来的“玄学”的影响,就更不足为据了。例如老子,西汉时代,人们还很客观的。《史记》记载了当时人们为之而争论激烈,有三位历史人物均曾被部分学士论证为“老子”。到底谁真谁假?当时人还定不下来:“世莫知其然否。”然而,到东汉班固时代,老子是孔子时代的人,就被当时人普遍相信了,或者默认了下来。所以此后就诸书一致,不再见有什么争论。两千年中,人们若以此为前提,来论证老子学说,或者更据此来论证《老子》与其他先秦学派之关系,那显然就只是揣测之论。失去学术上应有的客观尺度了。所以,书稿的作者冯铁流,还在20多年前的1982年,就认为老聃其人的年代,应有更科学的考证。在《学术月刊》发表了他的《老聃年代考》,认为据上古可靠史料,老聃确应是公元前374年出关去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但《老子》书则是他之后又过了几十年的人所作的。传统学界认为,老聃问题牵涉面很广,文章把问题处理得简单化了。所以后来,他又写了第二篇论老聃年代的文章。更详细地把历来人们主张“老子早出论”的考证,具体一条一条地,指出其错误之点是在哪里。分析出那些被世人认为“权威”的论文的论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晚近,上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了一批战国楚墓文物。其中有战国时代的,写在竹简上的《老子》三册。经考古学家崔仁义先生据实物考证后,认为这是比帛书《老子》及今本《老子》更原始的《老子》。楚墓中竹简《老子》文字,应是公元前316年以后的时代才写在竹简上的(见科学出

以新方法研究先秦诸子的《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代序)



出版社《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第12页)。这对本书作者冯铁流所说《老子》是写作于太史儋以后几十年,是非常相符的。而对于老子早出论,则不啻是当头一棒,一时被弄昏了头。不过,时间过去以后,近年来,不少上世纪已讲“老子早出论”数十年已成习气的人们,竟又把20世纪30年代的旧论重又搬出来:说是今日的通行本《老子》,作于战国前期,是最古的《老子》。倒把楚墓竹简的较原始《老子》,说成了只是一些“摘本。”因其已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时代不古,对他们无用,所以倒有人说是抄今日通行本《老子》的言论而辑录成书的。这样的理解,对早出论较为适合,但于历史的真实则不符。

本书稿的作者,依据先秦史料而作出考证,指出今通行本《老子》与帛书《老子》,只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把今本《老子》,与楚墓中竹简《老子》比较,条理清楚地对照出今本《老子》,是怎样地以楚墓竹简《老子》为底本,又再加上了战国其他学派的一些学术思想,扩充演变而来的。力求作到证据确凿,不容混淆。

有关老聃学派的争论是这样。其他先秦诸子的问题的论述,也都是这样,充满了新与旧的观点的是非争论。总之,读了这部书,人们对先秦诸子学派,就可作出以下明确的理解:

(1) 传统学界,对先秦诸子各处于什么时代,是没有弄清楚的。事实上是,那些被后世人称之为“道家”的先秦学派,其中的庄周学派,却是属于最早的学派之一。虽然老聃是在庄周之先,但他在世时尚未有什么学说流传于世。老聃派学说是到庄周晚年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庄周学说,其核心只是崇尚大自然。在人生哲学方面,他提出以“快乐”与“保全生命”,作为人们惟一应当追求的目标。但认为要达到这目标,则要以“无为”作为原则。那个“无为”,就是说一切都要避免人为的谋求或违背大自然。要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一切事。在庄周立说以后大约半个世纪,在齐国稷下和南方的楚国,才有一些被人们称为老子学说的学派兴起。



他们把庄周所说“无为”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把这变为“道”的观念。更把这“道”说成是宇宙的本原,由它而创立世界,形成为客观唯心论的老聃学派哲学体系。楚墓竹简《老子》C册,是其哲学体系中最早的著作。

(2) 孔子与孟子,虽然都属儒家,但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孔子的“仁”,是以周朝社会里传统的对亲族而发的那种“仁”,作为主要内容,而又有限地加入了一些带有博爱色彩的东周时代才兴起的新观点的“仁”,才结合成的一种道德观念。孔子又把周朝社会里传统的“礼”制,看做是与他的“仁”统一存在的道德。他认为“仁”,是内心的根据;合于礼制则是向外的表露。孔子一生的理想,是要天下实现一种由周天子来领导的礼制的社会(他认为周初就是这样的社会)。孟子则与他不同。孟子所说仁义,比较偏重于那种东周才兴起的新观点的仁。他不看重君主的权利,却专重维护人民的权利。他是战国时代最有民主观点的学者。

(3) 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实际上其学说,与法家有着同出于一个源头的关系。它们都主张带有博爱色彩的,东周社会才流行的那种以地域联系取代民族血亲联系的新的仁爱观念。但法家不讲爱,只是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专重视专制君主下的以法治国。而墨家,则更看重社会里人们普遍的爱,所以墨家文化,又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很有相近之处。不过比基督教要早400多年。

(4) 惠施是庄周的好朋友。他们两派学术都以对大自然的关注,作为起点。不过惠施是辩士。他的辩论题,都是从自然界中的各类事物取材,所辩论的内容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往往含有一些后世的高等数学之类的学术思想的萌芽。所以与古希腊的Sophist的辩论有一些相似之处;有的辩论甚至实质上相同。

惠施以辩者著称以后,约半个世纪,有公孙龙等“名家”出现。他们只是注重辩论事物的名称,及其所代表事物的实质之间的关系。对大自然不再关注。

以新方法研究先秦诸子的《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代序)



(5) 纵横家学派,是一个因针对强大后的秦国总不断地向东扩张领土,因而在关东六国最先兴起的,以军事战略观点为主而结合了外交、政治等活动的学术思想派别。后来被针对的秦国,也开展了这类学术活动。传统的说法,以为纵横家起源于外交官的技术。其实不然,它应当是起源于“兵家”。并且最初的发源地,也不是在赵国,而是在魏国。魏的惠施、犀首曾进行过一些合纵活动,结果失败。《史记》等记载误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惠施、张仪死后才开始其活动的苏秦所发动起来的,在时间上说错了约30年。合纵的活动在魏国失败后,其重心才转到楚国、赵国。

诸如此类的先秦历史的重新描述,是这部书的最显著的特点。诸子学派在这部书里,才以其文化、学术的真相,显示在世人的面前。并且使人们明白,先秦时代的那些灿烂文化,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比较开放产生出来的结果。而秦汉以后,为什么会使中华文化变得停滞不前?对这一点也进行了一些分析。

古代中国的传统学界,过于崇拜权威。总以为“真理”只能从权威们的代表——圣人、名人的言论中得出,不能由我们自己的理性推理而得出。西方人从来就不是这样认为的^①。古希腊人已经把他们的理性推求,作为找寻真理的主要方法。到了近世,如爱因斯坦所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作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4页)

爱因斯坦曾与辜鸿铭为友。对于中国哲学的特色,他是很知

^① 西方历史上,只有中世纪,被东方犹太所产生的文化统治,才极端崇拜神的力量,以它为惟一的真理之来源而抹煞了理性、知识的作用。



道的。中国传统学界,既不重视欧几里得几何那样严密的理性推证,又不重视系统的实验来发现真理。所以在专制帝国两千多年的中国,人们只晓得从权威们言论中去获得真理。能有创新思维的人很少。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所以直到如今,在主流上大都还是只晓得跟在名人权威的后面走,不能用先秦时代的可靠史料,去直接作实证的研究,不能打破名流权威们玄论的封锁。现在,这本书的出现,为那些想知道先秦诸子真相的中外人士,提供了一个超出两千年传统的、全新的认识方向。要知道,那些不是以正当理性推证和实验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是不值一文的!建立在传统玄说上面的权威,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所以笔者建议:不但钻研中国哲学的人,应多理解这种新的大方向,并且希望其他涉及中国古代学术研究领域的人士,也都能将此书作为参考书。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最悠久的,人口最多、最有发展潜力的大国。知识界人士,对于这个国家在悠久历史中文化发展转化的真实过程,究竟怎么样,至少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符合于客观历史的真实了解。

2002 年新春写于渝市南郊

目 录

孟子游历诸国考	(1)
齐威王时代孟子未曾游齐——讨论钱穆先生所述孟子游齐时代	(14)
庄周、杨朱年代考	(24)
老聃年代考——对老子年代的第一步探讨	(32)
先秦庄周学派早期思想之分析	(40)
庄周、杨朱学说比较观	(67)
从《庄子·天下》篇看先秦学派概况	(81)
有关老聃年代争论的问题分析——对老子年代的第二步探讨	(95)
战国中期各派思潮与《老子》的形成	(115)
孟子与告子辩论人性	(150)
先秦道家学派源流考与诸子年代图说	(160)
先秦各派思想之发生过程概说	(194)
从《论语》看孔学本质	(237)
先秦道家历程剖析	(251)
后记	(265)
附 先秦各学派起源与发展简图	



孟子游历诸国考

孟子之游历诸国,于战国史中,实为一重要事件。清人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中断定《史记》对孟子游历一事,记载不确;《孟子》叙孟轲游历系先梁后齐,为正确无误。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据之,以孟子于公元前 321 年游梁,作为孟子游历之开始。自此以后,《汲冢纪年》既受学界重视,持《史记》之说者,乃不得不调和折衷为说,将《史记》的记载修正为:孟子先游齐,盖齐威王时;后游各国及大梁,第二次再到齐国,方为齐宣王时。如此,既不否定《纪年》,又基本上肯定《史记》,乃两得其便。

今笔者为使百家争鸣之战国思想史,在史学界能得出正确明白之叙述,乃对孟子游历各国之年代,孟子所行经之路线以及其游历之概况,重新作一番探讨。

一、孟子游历诸国行经之路线

孟子游历,所行经之路线,学界对此从来有几种不同描述,有争论。但据《孟子》一书考之,至少有以下几段历程,在《孟子》各篇中已记载明确、次序分明,乃不容争辩者。

(一)《梁惠王上篇》开头五章记孟子见梁惠王,继之以相互



进行对话。第六章记孟子见梁襄王即位。第七章记孟子在齐,与齐宣王对话。至此,《梁惠王上篇》完。

假使《梁惠王上篇》之记事,是一章叙一事,其各章次序,是决定于客观上各事件发生的次序,而作排列的,则以下简式可成立:

孟子见梁惠王——见梁襄王——离开魏,以后有到齐游历见齐宣王之事。

这一简式是否正确呢?换言之,《梁惠王上篇》之各章,是否因所记事时间上之先后,而定出次序的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上篇》第一章至第五章记孟子到魏,依次与梁惠王对话之情况。第六章记载惠王死后,梁襄王登位,孟子见襄王,此时他尚在魏国。而《汲冢纪年》记载齐威王之卒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次年梁惠王卒,亦即齐宣王元年。则《梁惠王上篇》第七章所记孟子在齐与齐宣王对话,此事自当晚于第一章至第六章所记之事,此乃无可疑者。故时至今日,除极少数仍坚持不相信《汲冢纪年》的旧史家外,一般学者,于此《梁惠王上篇》均不得不承认其各章记事是顺时间上的先后而记载的。由于《汲冢纪年》在战国史研究中之重要性近几十年来已为学界公认,故持异说者亦无法争辩,因而以上简式无疑当能成立。

但这里应注意的是,“齐宣王元年”,《汲冢纪年》当公元前319年,《纪年》纠正了《史记》齐宣王当公元前342年之误。《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襄王以后,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以为襄王无可作为。大约此年即离开魏国,到齐国去游历。以公元前319年(即齐宣王元年)为孟子离魏游齐之年,大约在时间上是不会有很大问题的。

(二)《公孙丑下篇》第二章记载,“孟子将朝王”。王正派使来,称病不能就见,但孟子来则视朝。孟子亦称有病,此日不能造朝。此时,孟子在齐,与齐王关系甚僵。《告子上篇》第九章孟子说对于齐王,“吾见亦罕矣”,故即或能见到王,亦是“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所说亦当是此时之事。大约孟子第一次游齐，最初与齐王尚融洽，但不久以后关系即转紧张，孟子即有去志。《公孙丑下篇》末章记“孟子去齐”时，向其弟子追述他最初来齐时情况：“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指不受齐王某次所赠金）这也说明他当时与齐王关系之紧张。而此时恰值宋王偃即将称王（宋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孟子乃离齐至宋游历，并兼游薛。故此篇第三章，记陈臻问孟子以前“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后不同，到底哪一种作法是对的？由陈臻此问，可以证明，在孟子游历诸国之过程中，至少有一段历程，是由齐至宋，又由宋过薛而回到邹。陈臻当是在游了齐、宋、薛之后，在邹向孟子提出问题的。故以下简式必然可成立。

孟子第一次在齐——离齐至宋——离宋至薛——回邹。

但孟子此时已有不少弟子，在邹难以久留，《公孙丑下篇》第四章记载孟子又第二次游齐。此章记载“孟子之平陆”，由这地区到齐，大约居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以熟识者身份见齐王，论及平陆大夫孔距心能知罪。此当为孟子第二次到齐之最初情况。这以后，第五章记载孟子在齐，自称“我无官守，我无言责”，“进退……绰绰然有余裕”。则孟子自第一次到齐，直至第二次在齐之初，他都不过是一闲散下大夫地位的闲官，所以可以来去自由，无官守、无言责。但到了第六章，“孟子为卿于齐”，情况就不同了。《公孙丑上篇》第一、二章亦记载孟子初为卿时，弟子兴奋之情况，公孙丑说“夫子当路于齐”，齐国可望再见管晏时代之盛世了罢。又说：“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此时的孟子，已为齐国举足轻重的重臣了。故第六章“孟子为卿于齐”，显然应在第五章所记事件之后，这是无须多说的。第七章则记载孟子“归葬于鲁”，回齐国后，弟子充虞议论此丧事棺木似太美好。孟子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惟恐力不从心，今日地位既已



“得之”，而且又“有财”，则为何不用美木之棺。可见第七章的归葬，必是在他为卿以后。第八、九章叙述齐伐燕，及取燕后失败的事。此时孟子为齐卿，参与计议。第十至十四章，则依次叙述“孟子去齐”的一系列经过。从《公孙丑下篇》各章来看，从第二章直到末章，都是按所记事件时间上的先后，而定出次序来的，正如《梁惠王上篇》的情况一样。所以，据《公孙丑下篇》，以下简式当可成立：

孟子第一次到齐——离齐到宋——离宋经薛回邹——由平陆第二次到齐——在齐无官守、无言责——为卿于齐——归葬于鲁——齐伐燕——齐取燕失败——孟子去齐。

(三)《滕文公上篇》第一章，记载滕文公为世子时，两次过宋均见孟子。孟子力言滕有下决心作制度改变之必要，“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第二章记载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邹问丧礼于孟子。此时孟子已离宋，经薛回到邹了。参阅《公孙丑下篇》第六章“孟子为卿于齐”时，与王骀出吊于滕，可见当滕国过了一些时日，向诸侯发丧时，孟子已第二次到齐，并且在齐为卿了。此均为孟子未到滕以前之情形。《滕文公上篇》第三章，则记孟子游滕，向滕文公推荐“方里而井”的井田制办法。此事当在孟子已辞齐卿相之后。因为孟子未辞卿相之前，他在齐为重臣，是不可能又到滕国，与滕文公计划改变滕之土地制度的。

这以下，第四章叙述滕国行井田制以后，“仁政”之声名远传，许行、陈相等人慕名而远自楚、宋等国来滕，声称滕“行圣人之政”、“行仁政”，故而前来“愿受一廛而为氓”。此事当然是发生在第三章孟子、滕文公计议行“井田”改变之后，这是无须多说的。而后乃有第五章墨者夷之前来欲求与孟子讨论儒墨之道。故通观《滕文公上篇》，自第一章至篇末，全都是顺着有联系的各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发生次序，而作排列的。脉络分明，可一目了然。若以此篇再参合《公孙丑下篇》之第六章、第十章，则孟子自游宋



以至游滕,这段历程可以用以下的简式来表明:

孟子在宋,世子过宋见孟子——孟子回邹,世子使然友至邹问丧礼——孟子第二次到齐,为卿于齐。赴滕吊丧——孟子辞卿相去齐——以后有孟子游滕——滕行井田制——许行、陈相等来滕,孟子驳陈相——驳墨者夷之。

(四)《滕文公下篇》第一章记载孟子弟子“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如“枉尺而直寻”,主动去见诸侯。“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夫子之道就可以行于世了。孟子则认为,对于诸侯之招,各种人品应各种招,“非其招不往也”。眼下诸侯未有迫切求贤之招,我“不待其招而往”是不可的。若以利“枉尺而直寻”,其终必发展到为利而不惜“枉寻直尺”,就会曲己之道,随从他人同流合污,“枉道而从彼”了。

这一番议论,必是孟子在邹,尚未出游诸国时,与弟子的谈论。当时陈代对孟子不出而求见诸侯很有意见,认为孟子应当出游诸国。

其后不久,梁惠王晚年由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又“南辱于楚”,发愤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发出求贤之招。孟子大约于公元前320年到大梁(《史记》以公元前336年孟子游魏,此说之不准确,近代学者多已知之。盖《史记》以梁惠王卒于公元前335年,故误有此说,意即指惠王卒前一年孟子游魏也。但据《纪年》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故孟子到大梁,应在公元前320年左右。如此方符合《孟子》所载梁惠王向孟子痛言其“南辱于楚”等败绩事也)。今按《六国年表》、《张仪列传》,均载“张仪免(秦)相,相魏”,当公元前322年。孟子到大梁,正当张仪相魏后煊赫于魏之时。故《滕文公下篇》第二章“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景春出此言,大约是孟子师徒初抵魏时之事。第三章又记魏人周霄(战国时魏人习于称魏为“晋”,周霄亦然)问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答曰“仕”,但须“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